



甘肃藏族史

丹曲 谢建华著
民族出版社

GANSU
HISTORY
OF THE
TIBETAN
PEOPLES

K281.4.
P127

甘肃藏族史



丹曲

谢建华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肃藏族史/丹曲,谢建华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5

ISBN 7-105-05470-0

I . 甘... II . ①丹... ②谢... III . 藏族—民族历史—甘肃省

IV .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983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潮河印刷装订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875 字数:37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21.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第一汉编室电话:64271908;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序 言

陈庆英

甘肃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除了汉族以外，历史上有许多少数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有学者指出，从中国民族分布来看，从北方的蒙古草原经宁夏、甘肃、四川、云南，是一条从北向南的民族走廊；从陕西的关中平原经过甘肃、青海的陇西、河湟谷地、河西走廊到新疆，是一条从东向西的民族走廊，而甘肃正是处在这两条民族走廊的交汇地带。从藏族的发展历史看，还在唐代以前的上千年中，就有许多部落从青藏高原东下，在青海、甘肃地区形成西羌、西戎部落，同时汉族也在这个地区发展。吐蕃王朝建立后，更是大举东进北上，奄有陇右、河西和安西四镇，使甘青地区成为青藏高原的吐蕃和中原的唐朝紧密接触的地区，形成藏族历史上三大藏区之一的安多藏区。遗留至今的敦煌汉藏文写卷，就是唐代藏族在西北地区发展并与中原王朝建立密切联系的历史写照。元代以后，蒙古族、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等民族也在这一地区发展，形成了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其中，藏族对甘肃地区的历史影响十分重大，就是在今天，甘肃藏族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文化对全省的社会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编写一部系统、

序 言

完整的甘肃藏族史，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藏族在甘肃的分布主要是河西和甘南两大区域，各个区域的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因此，把甘肃省的藏族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难度是很大的。除了要了解整个中国历史和藏族历史以外，对甘肃藏区的历史也要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本书的两位作者经过多年努力，广泛收集和整理有关的藏汉文史料，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梳理出各个时代甘肃藏族的发展线索，勾画出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甘肃藏族的历史面貌，应该说是在藏族历史的研究中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我曾经在青海长期生活和工作，从事藏学研究以来，也曾经关注过对敦煌藏文写卷和甘青藏族历史的研究，因此对于这一研究的甘苦有亲身的体会，深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难度。两位作者是中国藏学界的后起之秀，其中，丹曲君出生在河西走廊，长期在甘南从事藏学研究，因而对甘肃藏区的了解是外地的学者难以达到的。出于对自己家乡和民族的热爱，对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他们以坚忍不拔的钻研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依靠多年的辛勤工作和深厚的学术积累，终于完成了这部很有分量的学术专著。作为年轻学者的著作，加上这一课题本身的难度，其中需要完善的地方容或有之。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完成了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丹曲君请我作序，推却不可，写了这些文字，聊表对他们这一学术成果的钦佩和祝贺之情。

2002年11月11日

目 录

序 言.....	陈庆英 (1)
绪 论	(1)
第一章 早期的甘肃藏族先民	(10)
第一节 藏族先民的远古文明	(10)
第二节 地理分布	(24)
第三节 藏族先民的生产与生活习俗	(26)
第四节 氐、羌部落的渊源	(30)
第二章 公元前 2070 年至前 221 年的甘肃藏族先民.....	(34)
第一节 夏代的氐羌	(35)
第二节 商代的氐羌	(37)
第三节 周代的氐羌	(38)
第四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氐羌	(40)
第五节 无弋爰剑与河湟诸羌	(42)
第三章 公元前三世纪至六世纪的甘肃藏族先民	(45)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甘肃藏族先民	(46)
第二节 三国时期的甘肃藏族先民	(54)
第三节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甘肃藏族先民	(57)
第四节 吐谷浑王国	(63)
第五节 人口迁徙	(65)
第四章 七世纪至九世纪的甘肃藏族——吐蕃	(67)
第一节 河陇地区的政治形势	(67)

· 目 录 ·

第二节 唐蕃洮河大战	(73)
第三节 唐蕃赤岭划界	(75)
第四节 吐蕃占领河陇地区	(77)
第五节 唐蕃清水会盟	(80)
第六节 吐蕃平凉劫盟	(82)
第七节 唐蕃长庆会盟	(85)
第八节 张义潮收复河西	(89)
第九节 蕃兵大起义	(91)
第十节 经 济	(92)
第十一节 文 化	(95)
第十二节 人 口	(98)
第五章 十世纪至十一世纪的甘肃藏族	(100)
第一节 河陇地区的民族状况	(100)
第二节 凉州六谷部政权	(102)
第二节 宗喀王朝	(105)
第三节 西夏王朝	(119)
第四节 北宋时期的蕃兵	(127)
第六节 河陇地区的经济	(132)
第七节 不同政权下的佛教信仰	(139)
第八节 多元文化	(144)
第九节 部落的分布	(148)
第十节 人 口	(152)
第六章 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的甘肃藏族	(154)
第一节 萨迦教派的兴起	(154)
第二节 萨班与阔端在凉州的会晤	(161)
第三节 八思巴与忽必烈	(165)
第四节 元朝在甘肃藏区的施政	(170)
第五节 藏传佛教在甘肃的传播	(176)
第六节 藏区与内地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188)

第七节	人口分布	(191)
第七章	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的甘肃藏族	(194)
第一节	明朝在甘肃藏区的施政	(195)
第二节	藏传佛教在甘肃藏区的传播	(200)
第三节	洮岷三杰	(208)
第四节	明朝在甘肃藏区的关隘设置	(211)
第五节	经 济	(221)
第六节	土司僧纲及部落人口	(229)
第七节	番民起义与蒙古势力的进入	(236)
第八章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甘肃藏族	(242)
第一节	和硕特蒙古进居甘青藏区	(243)
第二节	清政权与藏区政教势力关系的缔结	(245)
第三节	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	(247)
第四节	和硕特蒙古统治甘青藏区	(251)
第五节	清朝在藏区的施政	(253)
第六节	藏传佛教在甘肃藏区的传播	(256)
第七节	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转世系统	(261)
第八节	甘肃藏区的政教合一制度	(266)
第九节	拉卜楞寺施主青海和硕特蒙古亲王	(274)
第十节	拉卜楞寺与清廷的关系	(282)
第十一节	茶马互市	(286)
第十二节	文化艺术	(290)
第十三节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	(303)
第十四节	部落及人口	(307)
第十五节	反封建的斗争	(310)
第十六节	传教士的活动	(315)
第十七节	帝国主义在甘肃藏区的侵略活动	(318)
第九章	民国时期的甘肃藏族	(322)
第一节	宣侠父在甘南藏区的革命活动	(323)

· 目 录 ·

第二节	甘南人民反对军阀的斗争	(327)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	(336)
第四节	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和洮岷路保安司令部	(356)
第五节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经甘肃藏区	(359)
第六节	杨土司支援红军过甘南	(367)
第七节	甘南农民大起义	(371)
第八节	部落及人口	(380)
第九节	解放	(400)

附 录

大事记	(404)
藏族考古大事记	(425)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阿里善知识大德及众施主的信	(427)
重修凉州白塔志	(431)
重修白塔碑记	(433)
建塔记	(435)
嘉木样大师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	(436)
嘉木样及西南番各头目代表向部院总长的哭陈书	(439)
解决拉卜楞案陆洪涛给导河镇守使裴建准的电	(443)
甘肃省长督办公署为解决拉卜楞案给河州镇守使的命令	(444)
甘边藏族向甘肃军务督办冯玉祥将军的乞诉书	(446)
甘边藏民向冯玉祥、刘郁芬的请愿书	(449)
解决拉卜楞案件刘郁芬给黄位中的电报	(452)
藏民文化促进会组织大纲	(454)
拉卜楞藏民文化促进会组织章程	(456)
参考书目	(461)
后 记	(467)

绪 论

—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每个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位置都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都曾建立过全国性或区域性政权，产生过重大影响。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不仅要研究汉族的历史，还必须重视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离开了中国民族史，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科学的中国史。”^①

在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藏民族既有着悠久历史，又有着古老的文化传承。世界屋脊之所以闻名，就在于藏民族的伟大；雪域文化之所以辉煌，就在于藏民族的勤劳勇敢。藏民族对缔造伟大的祖国，保卫和开拓西南边疆，创造中华文明，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随着藏族文化的发展，藏族先哲顺应历史的潮流，用本民族

^① 江应樑：《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

的文字记录了自己悠久的历史，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如《柱间史》、《红史》、《新红史》、《青史》、《拔协》、《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智者喜宴》、《教法史——花蜜》、《王臣姓氏明灯》、《古昔教言——花鬘》、《嘛尼宝训》、《第吴教法史》、《教法史——佛法经幢》、《教法史——催开教莲之阳光》、《赞普世系》、《布敦教法史》、《王统记——金鬘》、《拉达克王统记》、《萨迦世系史——珍宝库》、《如意宝树史》、《木里政教史》、《贡唐王统世系》、《后藏志》、《教法史——奇异海》、《安多政教史》、《卫藏道场胜迹志》、《雅隆尊者教法史》、《五部遗教》、《萨迦世系史》、《止贡法嗣》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藏族社会不同时期的历史。

十七世纪后，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大量的藏文史料和珍贵文物被帝国主义劫掠到国外。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他们优越的经济实力，建立了藏族研究的学术机构。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大量的藏文史料随之流散，造成了藏族历史上罕见的文献外流。跟随达赖喇嘛而去的高僧喇嘛，纷纷被国外藏学机构聘用，从事大范围、多层次的藏学研究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藏民族历史、文化、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藏学。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藏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先后在北京、兰州、成都等地组建了一些藏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开始了对藏区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和藏学人才的培养工作。以于道泉、释法尊、张克强、贡噶活佛、格桑居冕、李有义、王静如、王森、柳升祺、黄奋生、段克兴、王沂暖等为主的藏学专家，专门从事藏学教学工作，先后培养了一大批藏学人才，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各地藏学研究机构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组织起了一支有较高素质的研究队伍，深入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藏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搜集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资料，对我国的

藏学研究作了初步的有意义的探索，产生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藏族历史论著，主要著作有《西藏社会概况》、《新唐书吐蕃传笺证》、《达赖喇嘛传》、《藏族简史》、《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藏族史略》等。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为藏族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恢复和设置了如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四川民族研究所和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四川省藏学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迪庆藏学研究所等藏学研究机构。藏学研究充分注意到了20世纪初发现的考古等新材料的运用，从政治史、宗教史、民族关系史、社会史等角度对藏族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研究，陆续出版了一批藏族历史研究的汉、藏文学术著作，如《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史明镜》、《西藏割据史》、《西藏简明通史》、《西藏政治史》、《藏族历史年鉴》、《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宁玛教派史略》、《噶举教派史略》、《萨迦教派史略》、《觉囊教派史略》、《藏蒙佛教史》、《蒙藏民族关系史略》、《蒙藏关系史研究》、《藏族史纲要》、《西藏佛教史略》、《藏族史略》、《羌族源流探索》、《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西藏地方货币史》、《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元朝帝师八思巴》、《宗喀巴评传》、《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桑耶寺简志》、《格鲁教派史略》、《长庆会盟碑与唐蕃关系的演变》、《西藏历史年表》、《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明代藏族史研究》、《宋代吐蕃史料集》、《藏族部落制度研究》、《吐蕃研究》、《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译注》、《吐蕃简牍录》、《蒙藏关系史大系》等。自此，藏族历史的研究已形成了初步体系，取得了显著成绩。

长期以来，藏族历史研究侧重于西藏历史的研究，甘、青、

·绪 论·

川、滇等省藏区地方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加大地方藏族史的研究力度，对整体了解藏族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青海的藏族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其中，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青海历史纪要》，从史前时期、战国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民国时期等历史时期，对青海的藏族历史进行了全面论述。黎宗华、李延恺先生的《安多藏族史略》，对安多地区藏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陈光国先生的《青海藏族史》，对上古时期的青海羌人、中古时期活动于青海的吐蕃和唃厮啰以及近现代的青海藏族，进行了翔实的考证。甘肃藏族历史的整理工作已成为藏学研究领域中亟须解决的课题，撰写《甘肃藏族史》已成为我们的紧要任务。

二

甘肃省地处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处，为我国的腹心地带，东连陕西，南接四川、青海，西邻新疆，北靠内蒙古、宁夏，是历史上中原联系中亚的主要通道，著名的“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横穿其境。境内雪山连绵，草原广阔，江河纵横。数千年来，广大的藏族就在祁连山南北及黄河上游的陇西等地繁衍生息。藏区占地面积较广，总面积为 138926 平方公里，牧业比重较大。藏族人口分布较为稀疏，主要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和河西走廊地带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以及陇南的岷县、宕昌、武都、文县等区，总人口约 411900 人（第四次人口普查数）。

甘肃藏区不仅自然风光雄奇瑰丽，而且人文景观丰富多彩。历史上的甘肃藏区，地处偏僻，交通闭塞，人文落后，历史典籍对该区的记载少而零散，人们对甘肃藏族历史的了解大多是一鳞半爪。二十世纪 30~40 年代以来，甘肃藏族史的研究逐步开展

起来。随着本地区一些散见的金石、简牍、档案及藏族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翻译，甘肃藏族史的研究获得了新材料和新途径。在甘肃藏族地方史的研究方面，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如黄正清口述、师纶整理的《黄正清与五世嘉木样》，樊保良、水天长主编的《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杨士宏的《卓尼杨土司传略》，苗滋庶、李耕、曲又新、罗发西合编的《拉卜楞寺概况》，觉乃·洛桑丹珠、冰角·婆帕次仁的《安多古刹禅定寺》，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合编的论文集《拉卜楞寺与黄氏家族》，丹曲的《拉卜楞寺简史》，旺谦、丹曲编著的《甘肃藏传佛教寺院录》，甘肃人口普查办公室编写的《甘肃藏族人口》，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甘南州志》以及有关各县县志等。然而就甘肃藏族的整个历史而言，至今尚未有人做过系统研究。有鉴于此，1997年初，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将《甘肃藏族史》的课题纳入了选题计划。

甘肃藏族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期，甘肃大地上就有人类居住。如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的考古发现，为我们了解甘肃藏族先民的文明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先秦时期，甘肃藏族先民羌、戎、氐等活跃在祖国西北地区，他们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部落众多，名称各异，分布广泛。此后他们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夏、商、周时期，羌人虽与华夏族发生了频繁的战争，但文化及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西周时期，羌人非常强盛，推翻了西周政权，并借机攻入了陕西、河南等地区，直到春秋时期，华夏族战胜羌人，这种局面才得到了扭转。春秋末年，中原和陕西的羌人逐渐被消灭和同化，残部退回汧、陇以西。战国时期，秦国与羌人也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和较量，最后，秦国消灭了羌人义渠王国，进兵渭首，征服狄禿，控制了羌人。羌人首领无弋爰

剑的后裔在甘、青、川、康、藏得到了繁衍，羌人出现了一次发展高峰，社会生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秦汉时期以后，甘青藏区的羌人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不同，称谓也发生了变化，大抵住在西南长江系统嘉陵江流域山谷地带的称氐，住在西北黄河系统湟水流域和洮河流域高原地带的称羌。汉武帝时期，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四郡，隔断了羌胡之间的联系。东汉时期，统治阶级和羌人进行了激烈的争斗，湟水、大通河、黄河、大夏河以及洮河流域成了争夺的地域。加之统治阶级政治腐败，对杂居区的羌人残酷压榨和奴役，羌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造成了民族间的仇恨，西羌反攻，东羌呼应，羌人势力蔓延到山西、河南中原一带，三国时期形成了陕、甘地区汉羌杂居的形势。

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动荡，羌人乘时东侵，纷纷建立割据政权。氐人前秦苻坚占据了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一带，后凉吕光占据了甘肃西北部和青海东部，仇池杨氏占据了甘肃东部和汉中北部，蜀成李氏占据了四川和陕南，后秦姚苌占据了陕西、甘肃和河南一带。西晋末年，吐谷浑攻入甘青藏区，与羌人发生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羌部落纷纷依附，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发展变化，羌人与吐谷浑、汉人等共同开发这一地区。吐谷浑兴起时，甘肃曾存在过宕昌羌、邓至羌、党项羌三个地方政权，一度占据今甘南的部分地区。这一时期，氐人和羌人与汉族交流频繁，高度接受了汉族文化，农牧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吐蕃帝国”。与此同时，中原地区出现了大唐盛世。唐蕃并驾齐驱，成为称雄亚洲大陆的两个强大政权，共同构筑起友好往来的“汉藏”金桥。在唐蕃互通有无的过程中，在甘、青藏汉交界处却演绎了一幕幕战火风云，对甘肃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九世纪中叶，吐蕃王国因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开始由盛而衰，继而分崩离析。与此同时，大唐帝国也日薄西山。此后，西北地区成为北宋、西夏和唃厮啰等汉、藏政权角逐的政治舞台，西北少数民族包括藏民族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漩涡之中。

十二世纪下半叶，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诸部，用战争的手段征服了北方的许多地区，灭夏伐金，统一中国。在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蒙古西凉王阔端在甘肃的经济文化重镇凉州，迎请了藏传佛教高僧萨迦班智达，进行了历史性的“凉州会晤”，树起了祖国统一的历史丰碑，雪域高原正式纳入祖国版图，甘肃藏区成为元朝对藏区施政的中心。

十四世纪中叶，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王朝，因兵力主要用于北边防御，故尊崇藏传佛教僧人，俾其“率修善道，阴助王化”，实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统治政策，以达到“隔绝蒙藏联络，巩固明朝的统一”的政治目的，在甘、青、川藏区设立卫所制，军政合一，同时推行土司制度，由汉藏官吏共同参治。这一时期，甘肃的河、洮、岷地区成为明朝向广大藏区施政的战略要冲，代表藏族文化精英的“洮岷三杰”——华丹嘉措、华丹扎西、释迦，成为往来于朝廷和藏区的使节，藏区得到了有效治理。

十五世纪中叶，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格鲁派确立了在藏区的统治地位，西藏地方的“政教合一制度”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甘肃卓尼杨土司的政教合一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拉卜楞寺也逐步形成了“政教合一制度”体系。这两大政教合一势力，对整个西北藏蒙地区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甘肃藏区处于清中央王朝直接统治下的土司土官统治、藏传佛教寺院政教合一统治相互交替的社会形态。

鸦片战争以后，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者像潮水般涌进了中

·绪论·

国，他们以“游历”“布道”为借口，先后闯入甘肃藏区，搜集情报，窃夺文物，建立教堂，从事政治和文化侵略活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遭到了藏、回、汉等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

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爱国革命志士忍辱负重，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洪流中，其中一些远赴边疆地区，点燃革命的火种，各族人民热烈响应，形成了极为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1926年，中共早期优秀党员宣侠父来到甘南，给藏族人民指明革命的道路，使甘南藏区摆脱了马家军阀的黑暗统治。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努力下，甘肃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先后在卓尼、肃南、拉卜楞创立了许多学校，甘肃藏族的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民族教育体系，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35年和1936年，红军越过千里雪封的岷山，渡过白水险隘栈道，攻克闻名遐迩的天险腊子口，在藏族人民的无私支援下，完成了长征史上一段艰难曲折的征程。也正是由于红军长征播下了革命火种，1943年爆发了以肋巴佛为首的甘南各族人民大起义，燃起了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熊熊烈火，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甘南民主革命洪流，震慑了国民党的腐朽统治。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甘肃藏区的有识之士积极响应地下党的号召，以他们特殊的身份，从事甘肃藏区的和平解放事业，最终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使甘肃藏族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三

甘肃藏族史虽然属于地方史的范畴，但甘肃藏族的历史发展离不开藏族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又由于藏族活动范围的广大和不确定性，民族分布与行政区域的不完全一致性，加之历史上河西走廊特殊的地理位置，考察甘肃藏族史不能离开西藏、青海、四